

生源压力影响师范教育?

■包万平

近年来,日本、韩国等国随着少子化现象的出现,学龄人口持续减少,公立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编制数量大幅缩减,教师数量也迎来“负增长”。

基于此,近期有网络舆论声称,我国很快也会面临在上述国家出现的学龄人口负增长、教师过剩问题,并影响国内高等教育师范人才的培养及相关就业问题。不少网友还针对目前国内某些师范生就业困难等现实,提出了“佐证”。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两大特点决定师范教育任重道远

在国际上,很多人口基数比较小的国家测算教师编制的常规依据是在学人数,也就是按照特定比例配备相应的教师数量。日本、韩国等国在出现少子化的同时,会减少公立学校的教师供给数,这是一种常态化操作。

存在同样境遇的国家还包括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荷兰、新加坡等国。它们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人口基数小、城镇化率比较高,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一致,教师供给相对较为富余,没有过多的历史欠账。

然而,我国与上述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至少存在两个明显特点。

其一是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比较突出。我国东部地区教育资源整体上相对富足,教师供给较充裕;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则相对不足,教师供给还有较大缺口,不少学校不得不招聘大量外聘、合同制人员。同时,随着各地城镇化的加速,许多教师更愿意去城市,甚至是大城市,而不愿留在偏远地区。这就形成了中西部、农村地区相对缺乏教师的现象。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是以教育公平为基础的,而教育公平实现的关键则在于教师。这就要求大量师范生仍要到广阔的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去,以缓解地区间师资配置不充分、不均衡的矛盾。

其二是教育基数大、历史欠账多。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方位、深层次的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师范教育通过培养高水平的教师支撑国家发展。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师范教育作为教师教育的主体力量,至今已经走过了百余年岁月,但在现实中还有大量历史欠账没有还清,尤其是在教师培养、保障与发展等方面。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有着更加迫切的向往。而某些地方还存在对教育和教师工作重视不够、师范教育体系有所削弱、对师范院校支持不够等现象。一些教师的素质能力难以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需要,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而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地位待遇有待提高等问题依然突出。

正是上述特点的存在,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师范教育依然是我国的重要教育形式。

“一个目标、四个基本点”

为解决目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典型问题,2018年,我国出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并在《教师法》实施 25



教师的成长与发展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培养优秀的教师需要职前、职后一体化设计,要建立师范教育与非师范教育互通、国际教师教育与国内本土教师发展衔接的立交桥。

年后启动了修法工作。

在笔者看来,我国启动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四个基本点”。

具体而言,一个目标是指提高教师的地位和职业吸引力。近些年,我国将教师队伍建设的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总体布局中,确立了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特殊法律地位。可以说,无论是启动“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推进教师资格考试改革、深化职称制度改革,还是创新编制配备、健全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实现不同区域教师队伍均衡发展,改革的核心目标均是从社会全局出发来保障教师待遇,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吸引力。

四个基本点分别是思想建设、能力建设、人事改革、开放提质。

思想建设重在强化师德师风。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将“突出师德”作为首要改革内容。为此,教育部出台了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为确保准则得到切实执行,还制定了若干相应的配套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提高师德师风政策要求的执行力,确保了教师队伍的纯洁性。

能力建设重在提升教师素质与专业化程度。在全社会对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专业化程度提出更高要求的当下,教育部等五部门出台了《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要求做到“吸引优秀人才从教,师范生生源质量显著提高,用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并鼓励部分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院校的师范专业,在招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或采取入校后二次选拔等方式,选拔有志于从教的优秀学生进入师范专业。

人事改革重在完善教师队伍管理体制。具体来说,一是提高教师的入职门槛。要求中小学教师必须是高校师范专业本科及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二是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包括工资待遇、住房、医疗等方面内容等。三是理顺教师管理体制机制。例如,在职称评审上,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职称初级职务和中级职务不受岗位比例限制,根据教师履行职务的年限和要求,依照规定晋升。

开放提质的重点是提质。开放则要求师范教育更加包容、多元。为此,《意见》提出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并且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2022年,教育部还启动“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提出以组团帮扶方式支持薄弱师范院校发展,推动建设高水平师范大学群”。

同时,为扩大教师供给来源的广泛性,我国在教师资格政策设计中也达到了最大程度吸引

优秀人才进入教师行列的要求,允许非师范生申请教师资格,畅通了全社会优秀人员进入教师职业的渠道。

师范教育面临培养模式挑战

回头来看,这些举措的效果正在显现。近几年,高考招生中师范类专业招生分数线直线上扬,各类人员报考教师资格的热度不减。这足以说明我国师范生及教师职业不但没“凉”,还会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变得更受欢迎。

然而,面向未来,推动师范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高水平师范生,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首先,必须确立“兴国之强师”的理念,这包括国家层面的整体性政策设计,也包括地方政府、高校、中小学等对教师成长与发展的细化安排。未来5—10年,通过加大师范教育投入,加强对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的支持,进一步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对经过专业认证、办学水平高的师范专业推出特殊招生政策,吸引发展潜力大、喜欢教师职业的生源优先报考。

同时,以造就“四有好老师”为目标,通过考核、晋升等多种方式,用10—15年时间全面提升教师的整体专业化水平。

其次,完善师范生培养模式。一方面,健全多元协同参与的师范生培养体制,以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为核心,建立以国家教师教育基地为统领、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优质中小学为实践基地的协同培养体系。另一方面,要突破传统以“老三课”(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强化以信息化与人工智能、全球与国际化、人类与可持续发展等为核心的“新三课”课程体系构建。同时,还要强化师范生技能培养,并以师范类专业认证为抓手,重点强化对师范生普通话、“三笔字”等基本技能的考核。

此外,还要完善全生命周期的教师成长机制。教师的成长与发展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培养优秀的教师需要职前、职后一体化设计,要建立师范教育与非师范教育互通、国际教师教育与国内本土教师发展衔接的立交桥。

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在学位点布局等方面向师范院校倾斜,搭建师范生在“本科—教育硕士—教育博士”等不同学历层次和职业成长上的进阶渠道与平台,形成教师职前师范教育、入职专业辅导和职后继续教育无缝对接的成长空间,实现多层次与终身化教师发展。

(作者系青海师范大学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研究员)

中国大学评论





李锋亮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长聘教授

先就业是解决毕业生 就业难的底线思维

刚刚过去的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毕业生普遍感受到更大的就业压力。可以预计,202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再创新高,这些毕业生又将面临怎样的就业形势?

在笔者看来,今年尽管毕业生规模会再创新高,但由于整体经济形势大概率将好于去年,且从年初公布的经济增长目标看,全国各地都表达了较快发展经济的决心,这无疑有助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此外,由于新冠疫情防控模式的变化,生活性服务业(比如餐饮、旅游、培训等)会逐步回归常态,生活性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又是非常强的,这都会导致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大幅度提升。

然而,宏观层面经济好转并不能保证每位高校毕业生都顺利找到满意的工作。以去年为例,一方面,高校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统计数据,当年我国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1100万人,西部农村很多中小城市依然需要大量高校毕业生。换言之,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主体压力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无工作可做,更多的是结构性就业矛盾。

因此,如果2023届高校毕业生能提前了解就业压力,并进行细致的职业规划,将有助于提升就业概率与就业质量。

具体而言,笔者有如下建议。

首先,高校毕业生要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依然非常可观。本专科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虽然下降趋势明显,但依然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而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则一直在快速增长。

其次,高校毕业生要有长线思维,即要认识到可观的高教收益率是需要自身通过长期工作才能获取的。如果没有这种认识,面对就业难时,毕业生及其家庭会面临巨大的困扰与疑惑——高昂的高等教育投资是否值得?何时才能收回投资?然而,事实就是高等教育的投资是短期支付的,但收益却是长期、“细水长流”式的。所以,高校毕业生要意识到自己尽管早已不是“天之骄子”,但只要策略得当,以长时间获得高回报是完全能做到的。

再次,高校毕业生要建立就业的底线思维——如果实在没有满意的工作,先就业是第一要义。如果毕业即失业,收回高等教育的投资起始时间就要延后,并在工作经验上落后于选择毕业即就业的同学。更重要的是,毕业生一定要对此趋势有战略把握——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经济发达城市纷纷出台各种政策与举

郑州师范学院心理学省级科创平台联合体 以心理学研究助力新时代应急管理创新

■本报记者 陈彬 通讯员 朱琳

近年来,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水日益成为相关部门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

将心理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应急管理实践,是实现新时代应急管理创新的社会心理学途径。因此,应以满足民众基本安全需求出发,洞悉人们在突发事件中的心理特点及其动态变化特征,这也是进行心理干预、完善应急管理机制、缓解公共焦虑和恐惧,甚至是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重要前提。

风险沟通质量与心理行为关系需考量

郑州师范学院心理学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联合体由河南省心理数据科学国际联合实验室、河南省心理危机监测预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河南省杰出外籍科学家工作室组成。近年来,该联合体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需求,针对突发公共事件开展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工作,将心理学理论、数据、结论与社会治理实践双向契合,为推动应急管理的体系和机制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

2020年1月23日,该联合体的研究团队依托科技部人才专项,启动了“基于情绪和行为反应的突发公共事件风险沟通策略”研究工作。研究负责人、联合办主任晋争教授介绍:“如何建议人们采取防护行动而又不引起恐慌,这是

政府在危机管理中面临的挑战之一,我们需要考量风险沟通质量与心理行为的动态关系。”

通过网络和新媒体手段,研究团队对武汉部分社区居民和湖北省外的部分居民开展跟踪研究,采集了新冠疫情发展阶段的关键纵向数据。通过交叉滞后模型,研究人员揭示了信息的有效传递与缓解公众焦虑和恐惧的相互作用机制,强调了信息共享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全球公共卫生管理合作的必要性。

该研究报告发表于《公共卫生前沿》(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引起了联合国减灾署、《医学资讯》(News Medical)等机构和媒体的关注,并被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数据库收录。

“时至今日,疫情防控政策因时、因势不断优化调整,依旧有必要就加强突发事件风险沟通能力和维持该能力的最佳方法提供持续性指导。”晋争说。

多重因素对风险认知和情感的影响应考虑

为探究不同国家民众在新冠疫情初期记忆最为深刻的本国和国际事件,以及本国和全球未来最可能发生事件的预期情况,郑州师范学院与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合作,共同启动了一项大规模跨境研究。

研究发现,各国民众记忆最深刻的事件均与新冠疫情相关,且其事件类别大体类似,譬如封锁、感染,但是这些事件被提及的概率受到感染率以及防控严格程度的影响。

在感染率高、防控程度较低的国家(譬如美

国),人们更多提及到“封锁”和“死亡”。在预期未来方面,大多数国家民众提及最多的未来事件是对经济的影响;相较于感染率高、防控力度弱的国家,在感染率低、防控力度强的国家,民众对经济的担忧更多;和过去事件相比,人们普遍对未来事件有着更积极的态度。

该研究揭示了当突发公共事件出现时,各国民众具有相似的记忆和对未来的预期,但是国家的应急管理水平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会影响群体的记忆及期待。

晋争表示,在应急管理中,我们应综合考虑事件的危害程度、暴露程度和管控力度对民众认知和情感的影响。相关报告2022年7月在线发表于《记忆与认知》(Memory and Cognition)。

应急管理能力的提高除了体现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外,还包括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后的应急管理。2021年7月,河南省郑州市遭遇了罕见的特大暴雨洪涝灾害。在暴雨发生后第一时间,研究团队便启动了相关研究,以应急支持为切入点,将当下灾难因素和灾难后因素加以整合,对426名成年郑州市居民进行测评,评估灾害后个体急性应激性障碍症状和创伤后成长状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受测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筛查阳性率为20.39%,创伤后成长发生率为44.74%;灾难暴露程度对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有显著正向影响;应急支持与创伤暴露程度的交互项对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预测效应显著。

鉴于应急心理支持在灾难暴露对应激障碍影响过程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该研究建议在引



世界卫生组织 COVID-19 数据库中相关研究的链接。图片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进和本土化紧急心理援助技术的同时,应启动应急心理支持系统的建设并提出具体对策。研究报告刊发于《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年第10期。

早期心理危机监测和预警要重视

心理危机干预作为应急管理能力的技术手段之一,强调对心理危机监测预警的常态化机制,做到早识别和早干预。

在这方面,团队成员使用本土化的测评工具,深入郑州市辖区内多所公立小学,与校长、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和心理辅导专职教师等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对话,通过把握校区学生情况,对心理测量系统的使用和保密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

在家长知情、同意的基础上,研究团队采集了上万名小学生(平均年龄10.36岁)和家长的

数据,发布了郑州市第一本《郑州市小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下称《报告》)蓝皮书。

据了解,研究团队之所以将研究对象定位于小学生,是由于精神问题一般在14岁前有所表现且有较高的诊断率。2021年6月,发表在《分子精神病学》的研究表明,精神障碍在14岁之前的发病比例为34.6%。成年期诊断的精神障碍患者一般在儿童期会表现出心理症状,这些早期心理危机未来有较高的概率发展为心理和精神障碍。《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的最新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临床精神高危人群在10年后发展为精神疾病的风险为35%。

“早期心理危机如果不及时识别和干预,发展为心理障碍后一般需要药物治疗结合心理治疗,难度较大。从全球心理学和精神学发展的现状看,其治疗效果也不理想。”作为《报告》主编,晋争表示,“部分学校心理测评工具存在时代滞后性,针对低龄群体有代表性的心理流调数据较为缺乏,心理普测流于形式且缺乏有效反馈。”

《报告》涉及了多维心理指标,对郑州市小学生心理健康进行了全面测评分析。基于实证结果,《报告》同时提出了政、校、企、研、医、家庭六位一体的青少年心理服务体系,为建立健全青少年心理状态监测、心理危机预警、心理支持联防联控、联动、联通模式奠定了基础。

突发事件下应急管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后续,郑州师范学院心理学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将持续与国内外院校、同业机构开展紧密合作,服务社会民众,为应急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